

論藏書與書藏

許媛婷

摘要

從古至今，我們習慣以藏書泛指圖書的保存與藏置，除了藏書一詞之外，到了宋朝，另有書藏名稱的出現。隨時代變遷及使用習慣的差異，藏書與書藏在詞義及運用上，先後出現迥異與重疊的矛盾現象；此外，書藏與佛藏、道藏、儒藏在名稱上看極近似，其間或有相為衍生及彼此影響的關係，這些變化對於研究圖書及相關探討者而言，實有深入探究之必要，故而就藏書與書藏於古今定義及運用加以探討，俾能更清楚的認知與瞭解。

一、前言

古代藏書，歷史悠遠流長，最早自商周冊簡產生開始，迄今超過二千多年的歷史。藏書的產生，最初源於人類運用圖繪與文字，將先前經驗、意念表達，及種種事物，透過不同的文獻載體記錄下來，並將這些文獻載體予以保存與儲放想法或概念之形成。

雖然早在商、周時期便有藏書概念的產生，然將藏字與書字二字連用，並當成專有名詞使用，卻是到了春秋戰國以後才正式出現於文獻之中。從古至今，我

關鍵詞 (Keywords)：藏書；書藏；佛藏；道藏；儒藏

Book Collection ; Shu-Chag(Zang) ;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;
Collection of Taoist Sutras ; Collection of Confucianism Sutras

許媛婷：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講師；E-mail:kikibooks@mail2000.com.tw

們多習慣以「藏書」二字泛指圖書冊籍的保存與藏置；但是除了藏書一詞之外，宋朝以後，還另外有「書藏」名詞的出現。藏書與書藏，此兩者於定義及使用上，是否重疊相近，抑或根本不同？又由於兩者出現的時間先後有極大的差距，是否受到朝代不同，或使用者的認知差異，而產生詞義迥異或兼用的現象？兩者之間關係為何，實在令人好奇。另外，由於書藏一詞，與佛藏、道藏名稱近似，是否即從佛藏、道藏衍生出來，其與佛藏、道藏意義是否相同？上述這些疑問，對於圖書研究及相關探討者，實有待進一步釐清與認定。然翻閱相關專著及期刊論文，並未對此一論題有所辨析，本文有鑑於此，故擬就「藏書」與「書藏」之定義及用法試加探討，並析論其同異。

在進行以下討論之前，對於「藏書」與「書藏」此二名詞之個別用字部份，先做說明。首先，關於「書」字，此指圖書冊籍而言，並無書寫、文字或書法之意義；至於「藏」字，則由於發音及詞性上的不同，以致在與書字連用時，可能產生一種以上的詞義。從藏字的音讀與字義探討，與書籍有關的部份，可以粗分成二種情況：

- (一) 藏字，若聲母為ㄘ，讀為平聲時，解釋作收存、儲藏、藏匿之義，當動詞使用。
- (二) 藏字，若聲母為ㄉ，讀為去聲時，則有兩種意義，一解釋作儲存東西的地方，有府庫之義；另一為宗教經典的總稱，如佛藏、道藏，當名詞使用。

不論藏字當成第一義或第二義解，當與書字結合成為專有名詞時，便會產生幾種不同的組合。先從「藏書」論起，藏字讀為平聲時，藏書一詞，便會出現有儲藏圖書李贄《藏書》之書名兩種解釋，由於李贄所著《藏書》一書並非本文探討的「藏書」之義，故不在討論之列；至於藏字讀為去聲，則指西藏或藏族圖書，此亦非本文的探討重心，亦去之。因此，在藏書詞義部份，顯然只有儲藏圖書一義為本文真正要探討的部份。至於書字置於藏字前面所形成的專有名詞「書藏」，藏字讀為平聲，可解釋作圖書儲藏、典藏之意；若讀為去聲，則可能出現兩種意義，一為藏放圖書的處所，另一則視同於佛藏、道藏，為圖書經典的總稱。兩者相較之下，顯然書藏二字的不確定性要高些，故而期能從古今文獻資料的蛛絲馬跡中，找出關於書藏二字的淵源及運用，藉此確認它的用法，並探索其與藏書一詞之間的關係，以明兩者運用之別。

二、古代藏書定義之探源及衍生

藏書一詞，最早是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際的典冊之中。根據《莊子》一書中的記載：「孔子西藏書於周室。子路謀曰：『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歸居，夫子欲藏書，則試往因焉。』」^[1] 句中的徵，為典的意思，所謂徵藏，即指典藏，而這的「藏書」，係指藏放圖書之意。另外，《韓非子》一書中也提到王壽負書而行，遇徐馮於周塗一事。徐馮對王壽說道：「書者，言也。言生於知，知者不藏書，今子何獨負之而行？」^[2] 這的藏書，則指懷藏書籍之意。雖皆稱藏書，詞義上則略有分別。然不論上述藏書所指何義，藏書二字出現的時間最遲不會晚於戰國末期，則是肯定的。

既然藏書一詞出現甚早，從各種史載資料中，也可看出藏書二字隨時代進步所產生出來不同程度的解析。根據《周禮》天官·冢宰 記載：「五曰府，掌官契以治藏。」鄭玄注：「治藏，藏文書及器物。」^[3] 此處藏字，為收存儲藏。治藏二字，係指治理收藏之意，鄭玄還進一步說明，治理收藏的對象包括了文書及器物。另外，藏字還有匿藏之意。據《說文新附》艸部 對藏字的解釋：「藏，匿也。」^[4] 所謂匿，有私下收藏的意味。《史記》秦始皇本紀 提到：「天下敢有藏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」^[5] 這的藏字，即指私下匿藏。至於匿藏對象，雖未將藏字與書字連用，然從字句中得知匿藏對象係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百家語等特定圖書而言，此處藏書之意，不言而喻。

藏書二字起源雖早，然不論從商周王室公家藏書，或至春秋諸子私人藏書興起，初時所稱藏書大多單指收藏圖書此一行為，並未深入探究藏書之重要性或價值。真正體認到藏書的重要性，並將藏書視為國家重要政策之一，一直要到漢朝以後才開始。根據《漢書》藝文志 的記載：

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曰：『朕甚閔焉！』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

[1] (周)莊周撰，(晉)郭象註，《莊子》外篇 天道 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0.12)，頁272。

[2] 王先慎，《韓非子集解》第七卷(喻老)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3.6)，頁269。

[3] 見(漢)鄭玄等注，《周禮注疏及補正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.5)，頁15。

[4] 參見《漢語大字典》(湖北、四川：湖北辭書出版社，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6.10)，頁331。

[5] (漢)司馬遷，《史記》卷六 秦始皇本紀 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.11)，頁255。

諸子傳說，皆充秘府。^[6]

這提到的「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」，乃漢孝武帝漸體認藏書之於國家禮樂文治的重要性，遂將藏書此舉視為國家政策之一；至於所設專門寫書之官員，除抄錄天下頗出之眾書外，並校理脫簡殘缺之舊文，可見其對藏書重視之程度。孝武帝的建藏書之策，究其史載，雖僅著眼於搜訪殘佚的舊籍圖書，然對於藏書一詞使用的確立，已從泛指收藏、懷藏圖書之概念，轉變成收藏圖書典籍之專門名詞；再者，收藏圖書的重要性與價值也藉由皇室詔令得到某種程度的肯定。

漢朝對於藏書的建樹，還不僅於此。至成帝時，詔光祿大夫劉向負責圖書整理工作，其不僅校理書籍，還將校理後的圖書條其篇目、撮其旨意，錄而奏之；後劉向卒，其子歆繼承父業，又將圖書依類別分，總群書而纂成《七略》。經過劉向與劉歆父子兩人整理後，圖書除了收藏之外，還增加校勘、鈔錄、分類、編目等後續處理工作。此種將藏書與編目結合的作法，使得藏書從單純的收藏置放觀念，擴大變成與收藏圖書之相關校錄編目活動亦可納入藏書範疇。自此之後，凡論及藏書，必然會提到圖書目錄，便由此起。

到了隋朝，除延續前朝奠定下來良好藏書基礎外，隋煬帝還將秘閣所藏圖籍謄寫 50 副本，分成三品，並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；唐朝之際，不僅購求天下書，還設弘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三館專門藏書，並將圖書按類分之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為次，列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庫，其本有正有副，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。^[7] 可知藏書概念發展到隋唐以後，其對於藏書的關注，除原有的搜羅典藏、著定書目之外，還涉及了藏書機構、典藏環境，以及圖書裝幀等相關論題。此種由圖書本身的收藏保存要求，發展至注重外在典藏環境及裝幀美觀的風氣，在當時可說是從公家藏書一直延續至私人藏書，甚至於自唐朝影響至宋朝以後，迄於今日，猶然遺有餘風。

而隨著圖書的日趨普及，藏書概念也日漸趨於清晰豐富，對於藏書的範疇與要求自然更為擴大與嚴格。自宋朝以來，歷經元、明，以至清朝，不論在公家或

^[6] (漢)班固，《漢書》卷三十 藝文志 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.11)，頁1701。

^[7] 其集賢院御書，經庫皆鈿白牙軸、黃縹帶、紅牙籤；史庫鈿青牙軸、縹帶、綠牙籤；子庫雕紫檀軸、紫帶、碧牙籤；集庫綠牙軸、朱帶、白牙籤。見(後晉)劉昫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.11)，頁2082。

私人藏書領域，都朝著蓬勃發展的路線前進。因此，眾人在藏書的認知與討論上，亦出現廣泛而多元的觀點。宋朝不論公、私，藏書環境皆發展成熟，根據程俱《麟臺故事》^[8] 記敘北宋館閣^[9] 藏書規模與圖書整理情況，可從其中 書籍、校讎、修纂、儲藏 等篇論題中，發現宋代館閣對於圖書的態度，從訪求、搜購、抄錄、藏置，以至於編目、校勘、修纂，甚至於利用，都有專門官員各司其職，並有完備體制加以掌控管理；至陳騭《南宋館閣錄》，及其後續編《南宋館閣續錄》^[10]，雖是承諸於《麟台故事》而來，然書中述及南宋對於藏書，從進書有帳簿、入庫有牌經、校勘有課程、抄補有規制、著錄則有各種書目，並且有專門管理的人員；同時，每年曝曬圖書，以防止霉損及蟲蛀；對於圖書的借閱流通，亦極嚴格，這些措施不僅建立良好典藏管理制度，也開拓了藏書範疇及體制，其中部份藏書觀念還影響到日後明、清兩朝，甚至於到近代，仍然沿續採用。

明、清兩朝，主要為延續宋朝以來的藏書觀念及管理體制，不論公私藏書，都有更為進步的發展空間，對於藏書的要求與認知，或有因為藏書者的典藏環境與自我期許的不同，而有所差異，然基本上仍依循著前人腳步而更為擴展。其中尤以私人藏書方面，較之前朝，發展更為蓬勃，藏書理論亦隨之興起。如明代胡應麟便認為藏書家應有兩種，一種為務為觀美，觸手如新的好事家；另一種為枕席經史、沉緬青緗的賞鑒家。^[11] 另外，明祁承燾則在藏書之餘，並就購書、求書、鑒書、聚書此四項要點，提出種種論點以供諸藏書家參考。^[12] 至清朝以後，洪亮吉將明清藏書家分成數等，分別是考訂家、校讎家、收藏家、賞鑒家，以及掠販家五類^[13]；後來葉德輝歸結洪氏看法，認為考訂校讎可統名之著述

[8] 《麟台故事》，北宋紹興元年（1131）程俱編纂，原書十二篇，列為五卷，今傳本多殘。麟台，即指宋朝的祕書省。

[9] 宋代館閣，原指三館和祕閣。宋承唐制，設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三館以典司史籍，後來又建崇文院以寓三館，及至端拱年間，朝廷又設祕閣於崇文院，並以祕閣與三館並列，合稱館閣，為國家主要藏書之地。

[10] 此《南宋館閣錄》原名《中興館閣錄》，共有十卷，為南宋淳熙四年（1177）祕書監陳騭與其同僚共同撰集；而《南宋館閣續錄》，則原名為《中興館閣續錄》，共十卷，不著撰人。見徐雁、王燕均主編，《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》（四川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0.7），頁162。

[11] 見（明）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四 經籍會通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.4），頁62。

[12] 見（明）祁承燾《澹生堂藏書訓略》一文，引自袁詠秋、曾季光編，《中國歷代圖書著錄文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.10），頁309-318。

[13] 見（清）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卷三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.9），頁83。

家，其他校勘、收藏、賞鑑家則各有所長^[14]；而孫慶增在《藏書紀要》一書中，更是從圖書的購求、鑒別、抄錄、校讎、裝訂、編目，甚至於保管維護的收藏、曝書等等，提出他個人的見解。^[15]除此之外，明清的藏書家除著眼上列所述之外，在圖書整理方面還喜愛撰寫藏書題跋、刻章用印，以顯其對於藏書之珍愛慎重。由上述得知，舉凡校勘、收藏、鑑賞、題跋、用印皆屬明清時期藏書範疇之重要發展。

三、古代書藏名詞之出現及轉折

至於書藏二字，最早出現連用，並成為專有名詞，應始於宋朝蘇軾於錢勰藏書閣上所題的「錢氏書藏」四字。錢氏，為錢勰之弟錢勳。根據凌迪知輯《萬姓統譜》記載：

錢勳，字岳甫，以孝義知名，居於錢塘門外九里松之間。嘗建傑閣，藏書甚富。蘇軾榜曰：錢氏書藏。仕至直秘閣，知荊南府。墳墓在靈隱、天竺兩山之間。^[16]

另外，清錢保塘《乾道臨安志札記》一書記載錢勳之事，與《萬姓統譜》幾近全同^[17]，而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則是記載：

錢勳，一字岳甫，錢塘人，勰弟。居杭州九里松，建傑閣，藏書甚富，蘇軾榜曰：錢氏書藏。以孝義知名。仕至直秘閣，知荊南府。^[18]

由上所述，錢勳以藏書甚富著稱，又官至直秘閣、荊南知府，然其個人史料並不多，《宋史》亦無列傳。僅見溫益列傳下有這樣一段記載：益舉相蔡京，後京遂為相。一日，京任命監司、郡守十人，益稍不謂然。京遂使人問之，益回答：「今丞相所擬錢勳而下十人，皆其姻黨耳，欲不逆其意得乎？」^[19]由

[14] 見（清）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九（臺北：文哲出版社，1988.4），頁495-496。

[15] 見（清）孫慶增《藏書紀要》，引自袁詠秋、曾季光編，《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錄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.12），頁278-288。

[16] 見（明）凌迪知，《萬姓統譜》（據明萬曆七年（1579）刻本影印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71.4），頁531。

[17] 見（清）錢保塘，《乾道臨安志札記》記載：「錢勳，字岳甫（一作岳仲），以孝義知名，居於錢塘門外九里松之間。嘗建傑閣，藏書甚富，蘇軾榜曰錢氏書藏。仕至直秘閣，知荊南府。墳墓在靈隱、天竺兩山之間。」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.5），頁103。

[18] 昌彼得、程元敏、王德毅、侯俊德等編，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6.12），頁4071。

此僅可得知錢勰與蔡京可能有姻親關係，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議論之處，至於錢勰與蘇軾的關係，史籍中似無特別記載。

史籍雖沒有論及蘇軾與錢勰的交往情形，然從蘇軾所留下來的詩文加以觀察，反而發現蘇軾與錢勰之兄錢勰兩人關係顯然密切許多。在蘇軾詩作之中，便有十多首詩或為蘇軾主動，或與錢勰應答唱和之作。^[20]由於錢勰與蘇軾曾同在西掖，又分別去守越、杭，可見兩人是在患難與共、志道相投情形下所產生的交情，因此不僅情誼匪淺，彼此間交遊也相當密切。然而，蘇軾與錢勰二人雖交情甚篤，但東坡與錢勰之弟錢勰之間，卻顯得陌生許多，不過也並非全然不識。至少從東坡與錢勰遙寄杭州錢勰的「和錢四寄其弟勰」一詩看來，兩人交情雖不見得深厚，但也略有認識。其詩乃蘇軾見錢勰寄其弟勰詩作，遂而和之：

再見濤頭湧玉輪，煩君久駐浙江春。年來總作維摩病，堪笑東西二老人。老來日月似車輪，此去知逢幾箇春。昨夜冰花猶作柱，曉來梅子已生人。^[21]

由詩得知，東坡理當認識錢勰，然二人關係自是建立於錢勰之上。據此推測，蘇軾極有可能得知在錢勰興建藏書閣一事後，或受其邀請，或因與其兄錢勰之間的深厚交情，無法推辭，於是當場揮毫題字，留下「錢氏書藏」四字。當時情境如何，今已不可考，唯蘇軾所題的「錢氏書藏」四字，不僅留名千古，也為後人留下令人疑惑的謎團。

一般來說，文中論及書藏二字，大多用於句子中間，將藏字當動詞使用，書藏也多解作「將書藏於某」，幾甚少見將書藏二字連用，當專有名詞使用。因此，蘇軾所題「錢氏書藏」，便可能有二種涵義，第一種乃指藏書之義，不題藏書，而題以書藏，乃係平日常文字書寫倒裝句型之沿用，其目的自是為有用來加強語調，以及美化字詞的作用，藏字讀為平聲；另一涵義則將藏字解作處所、府庫而言，藏字取藏室之義，讀為去聲。此二者何者為東坡題字之本義，實為見仁見智，端視藏字之音與義做何解讀，東坡題字書藏，既可當成藏書之義，但若言藏

[19] 見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三（溫益列傳）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.11），頁10923。

[20] 除了「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二絕」、「和錢穆父送別並求頓遞酒」為送別詩外，其他像是「次韻錢穆父」、「次韻荅錢穆父作詩見及」、「次韻錢勰待制秋懷」、「次韻錢越州」、「次韻錢越州見寄」、「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」、「次韻荅錢穆父見寄」、「次韻錢穆父會飲」、「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」、「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」、「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」等等，係皆和韻之詩。

[21] 蘇軾此詩見於《蘇東坡全集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.1），頁213。

書之處，亦無不可。然若從東坡平日撰文習慣看來，其論至藏書處大多仍以藏書二字加以敘說^[22]；其次，東坡題「錢氏書藏」四字，主要係祝賀錢蘇藏書閣的建造完工，若是將此書藏一詞視為藏放圖書之處所解釋，或較切近些。

從宋朝至元、明，各種文獻記載中似乎極少見到將書藏二字視為獨立使用之專有名詞，直至清阮元《杭州靈隱書藏記》，以及後來的《焦山書藏記》，才又再次將書藏一詞拿出來使用。關於這兩篇文章的撰成，係因阮元先後於靈隱及焦山二處設置藏書樓閣，並專門為之作記所留下來的文章。第一次為清嘉慶十四年(1809)，阮元在二度擔任浙江巡撫時，與諸名士同遊靈隱寺，其間從眾人口中得知著名學者翁方綱《復初齋集》始刻成，欲置一部於靈隱寺之事。於是阮元與眾人心生感慨，認為古籍雖可傳世千百之久，然聚存不易，為免善本良籍散佚，遂決定於杭州靈隱寺大悲閣後設立藏書木櫥，乃按唐人宋之問《靈隱寺》一詩之句文予以編號排列；此外，還大書「靈隱書藏」四字匾額，懸於閣楣；並慎重地制定入藏條例九則，最後為之題詩作記。從阮元《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》一詩中，可以看出當時設立靈隱書藏之因緣際會，詩文如下：

尚書未百篇，春秋疑斷爛。列史志藝文，分卷本億萬。傳之千百年，存世不及半。近代多書樓，難聚易分散。或者古名山，與俗隔崖岸。峇嶠靈隱峰，琳宮敞樓觀，共為藏書來，藏室特修建。學人苦著書，難殺竹青汗。若非見著錄，何必弄柔翰。舟車易遺亡，水火為患難。子孫重田園，棄此等塗炭。朋友諾黃金，文字任失竄。或以經覆瓿，或以詩投溷。當年無副本，佚後每長歎。豈如香山寺，全集不散亂。名家勒巨帙，精神本注貫。逸民老田間，不見亦無悶，雖不待藏傳，得藏亦所願。我今立藏法，似定禪家案。諸友以書來，收藏持一券。他年七十廚，卷軸積無算。或有訪書人，伏閣細披看。古人好事心，試共後人論。既汎西湖舟，旋飽蔬筍飯。出寺夕陽殘，鷲嶺風泉渙。^[23]

按詩文內容，阮元說道：建靈隱書藏一事，乃基於近代藏書樓雖多，然而難聚易分散；再者，學人著述，意在藏諸名山，若能得藏乃畢生所願，故而建此藏書閣樓於靈隱寺，以達真正存藏圖書之良意。

[22] 翻閱《蘇東坡全集》論及藏書《李氏山房藏書記》一文中，提到「余友李公擇，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，藏書凡九千餘卷。」，頁353。

[23] 見(清)阮元《學經室四集》詩卷八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.3)，頁849。

至於書藏二字，阮元則在《杭州靈隱書藏記》一文中，從古代周官治藏之事論起，說明取名書藏一詞之名稱及意旨：

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，史記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。藏書曰藏，古矣。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。收藏之與藏室，無二音也。漢以後曰觀，曰閣，曰庫，而不名藏。隋唐釋典大備，乃有開元釋藏之目，釋道之名藏，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。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，儒何獨無？欲聚書鼎立，其意甚善，而數典未詳。^[24]

文中指出：「藏書曰藏，古矣。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，收藏之與藏室，無二音也。」意即在阮元的想法中，古人用「藏」字本無音別，而今藏字別出二音，乃後人刻意區分之故。因此，藏書與藏室的藏字，兩者應為同音，至於詞義則從「漢以後曰觀，曰閣，曰庫，而不名藏」加以推測，此藏字當有府庫、處所之義。既然藏字有府庫之義，書藏二字連用，自是指典藏圖書的地方。其後，阮元又說立此「書藏」，乃與諸君子同過靈隱食蔬笋，語及藏翁氏《復初齋集》集，眾人遂提議：

史遷之書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。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，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，皆因寬閒遠僻之地，可傳久也。今復初齋一集，尚未成箱篋。盍使凡願以其所刊、所寫、所藏之書藏靈隱者，皆裒之，其為藏也，大矣！^[25]

由上可知，阮元設此書藏，一則希望能以此藏書處所達到裒聚圖書之良善美意；另則，阮元也因釋藏、道藏名稱最初係取自儒家之古名，然今佛道釋藏之名確立，儒藏反而未能發揚光大，遂欲全其不足之處。這樣的想法，表現在他於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又再起設「焦山書藏」一事之時最為明顯。

「焦山書藏」設置，乃是阮元於揚子江口與焦山詩僧借庵、巨超、詩人王柳村論詩之暇，談及藏書事，眾人遂議於焦山再立書藏。阮元隨即又寫了《焦山書藏記》一文，文中再次重申：

嘉慶十四年，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，且為之記。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，曰閣，而不名藏。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，史記老子所守，至於開元釋藏，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，以示異也。^[26]

[24] 見（清）阮元《學經室三集》卷二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.3），頁577。

[25] 同註24。

[26] 見（清）阮元《焦山書藏記》，《學經室三集》卷二，頁578。

既而可知，阮元立藏心意堅決，其置焦山書藏，一如靈隱，以次第分號，復刻銅章，書樓匾，訂條例。後又稱：

此藏立，則凡願以其所著、所刊、所寫、所藏之書藏此藏者，皆哀之。

千百年後，當與靈隱並存矣。^[27]

阮元為立書藏一事，煞費苦心，惜迄至今日，書藏一處已隨時間而湮滅不存。然阮元所提書藏一詞，幸得其詩文，使後人因此瞭解阮元重視藏書之理念；而由他試圖藉由書藏的建立，期能為明曹學佺倡導的儒藏想法提供更完備切合的實踐成果，便可看出他的用心。由於阮元題匾「靈隱書藏」及「焦山書藏」，並為之記，可知阮元用此書藏一詞不僅為專門名詞之使用，同時也說明此藏乃為藏置圖書之場所，至於他提出曹學佺所倡之儒藏，以及釋藏、道藏名詞，欲申明書藏之立與其他各藏當可鼎足而立的想，顯然阮元是充份將他之前提到的「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」加以發揮，將藏字當成既有管理治藏之義，又兼藏書處所，同時又與儒藏意義相通，三者兼而用之。

然而，佛藏、道藏及儒藏，甚至於阮元提出的書藏，此四個名詞意義是否完全相同？恐怕是值得稍加探討的。首先，論佛藏與道藏的形成，最初應該先從佛教開始有佛藏的編纂，後來道教才沿用之。

佛藏，又稱一切經、大藏經、藏經、釋藏，為佛教經典總集之稱。兩漢之際，佛教傳入中國，漢譯佛經數量隨著佛教刻意宣揚情形下日益增多，至南朝梁，佛教經典達5,400卷之多^[28]，算是相當豐富。然是時並無實質的總集編成，而真正的佛藏編集則要到隋唐以後才算確立。隋文帝時曾大規模命官寫一切經，置於寺內，而又別寫，藏於秘閣^[29]；唐朝以後，太宗貞觀九年（635）敕寫一切經；貞觀十一年（637），皇太子於延興寺造一切經；後高宗顯慶三年（658）又造藏經800部，藏於西明寺^[30]；另則，麟德元年（664）又敕大敬愛寺寫一切經^[31]；到了玄宗天寶元年（642）則有詔寫一切經三部。

^[27] 同註26，頁579。

^[28] 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敘述華林園中「總集釋氏經典，凡五千四百卷，沙門寶唱撰經目錄」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79.10），頁145。

^[29] 同註28，頁146。

^[30] 見（唐）釋靜泰，《大唐東寺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》卷一（收入《大藏經》五十五冊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3.1），頁180。

^[31] 同註30，頁180-181。

唐代稱所寫佛經，為一切經，意即所有佛教經典的範圍皆包括在內，雖然從內容及體制上，並未十分完備化與定型化，但為日後我們稱呼佛藏的初步實質總集，則是無庸置疑的。從五代以後，到北宋年間，大藏經一詞開始逐漸取代一切經、眾經的名稱。早先大藏經係由諸佛經寫本匯聚構成，至宋朝開寶四年（971），才有第一部的漢文大藏經開雕。這部大藏經刊於益州，歷時12年，刻成經版13餘萬塊，印成經480帙，1,081部，5,057卷，以千字文編帙號，稱《開寶藏》。^[32]自此以後，佛藏的形成與內容有了明確的依據，其後雖陸續有《崇寧藏》、《毗盧藏》、《圓覺藏》、《資福藏》、《磧砂藏》，以及遼刻《契丹藏》，金刻《金藏》等藏經刊印，然都在《開寶藏》基礎上編纂而成的。

至於道藏的形成，也是在隋唐以後才開始趨於定型。最早道教藏書見於著錄，為晉葛洪與其師鄭隱藏書。根據葛洪《抱朴子》遐覽^[33]描述鄭隱藏書情形及粗略記錄，得知鄭隱藏書甚多，然則一來所藏不全，再者亦無編目整理過程，僅可稱其為最早史載道教的大量藏書，猶未構成道藏之彙集；其後，陸續記載有劉宋陸修靜收有道教經典1,228卷，並將其類分成三洞、四輔、十二部^[34]；以及北周玄都觀道士編道教經目；至王延作《三洞珠囊》七卷。^[35]此一時期，為唐代編纂《道藏》前的重要過渡階段。

唐玄宗先天中（712-713），敕太清觀主史崇玄及各道觀大德，并昭文館、崇文館學士等四十餘人，修《一切道經音義》。一切道經，為唐代對道經總集的稱呼，這本道經音訓係據京中見存的兩千餘卷道經而作，有百餘卷之多，且編有目錄。^[36]至開元年間，玄宗又令搜訪天下道經，進行校勘、整理，列其書為道

[32] 《開寶藏》，又名《開寶大藏經》、《北宋敕版大藏經》、《蜀版大藏經》，為我國第一部刻本《大藏經》。《開寶藏》以《開元釋教錄略出》為收集經目之依據，刻成後，前後刷印一百四十年，其間經太宗至神宗多次修正與增訂，又有「咸平本」、「天熙本」、「熙寧本」等版本，最後總量達639帙，1,530部，6,604卷。見童璋，《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1.8）。

[33] 見（晉）葛洪，遐覽：「積年之中，合集所見，當出二百許卷，終不可得也。」《抱朴子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8.3），頁114。

[34] 三洞指洞真、洞玄、洞神；四輔指太玄、太平、太清、正一；十二部分別為本文、神符、玉訣、靈圖、譜錄、戒律、威儀、方法、眾術、記傳、贊頌、章表。參見胡孚琛、方廣錫《道藏與佛藏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3.12）。

[35] （北周）玄都觀道士所編道教經目，收道經、符圖等，計約6,363卷；王延作《三洞珠囊》七卷，經傳疏論凡8,030卷。見陳國符，《道藏源流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.12），頁108。

[36] 據《新唐書·藝文志·道家類》著錄《道藏音義目錄》一百一十三卷；另，玄宗御制一切

藏，並編目錄^[37]，史以「開元道藏」稱之。天寶七年(748)，並詔傳寫以廣流布，此為最初道藏的具體成型。唐代之際，道藏雖已成型，然當時主要以寫本形式存藏，而從唐末延續到五代，歷經戰亂摧殘，道經亡佚散失嚴重，直至宋朝，才又有徐鉉、王欽若、張君房等人，將道藏重新增補編修。至徽宗政和三年(1113)，將眾道士校定道書，送到福州閩縣鏤版，是為《萬壽道藏》，為道藏首次的刊版雕印。^[38]自此之後，道藏編纂便大抵是在這個基礎上發揮進展的。由此可知，道藏同於佛藏，皆為宗教性經書典籍所匯聚總集而成的，而此種將經典圖書匯聚而成的方式，即為叢書形式的編纂形式。

既然佛藏跟道藏，從性質及體制看來，皆屬叢書之纂輯。然明曹學佺提倡的儒藏與清阮元構想的書藏，其在匯聚概念與方法上，是否與佛藏、道藏一樣？此或可從楊家駱《叢書大辭典草創本序例》所提看法加以探討：

前人以釋道二家典籍散亡較少者，以有釋道二藏為之哀聚也，於是倡為儒藏，以仿二氏者。不知叢書彙刻，亦即藏之具體而微者也。保存之效，初無二致。蓋單行散刻，得之匪艱，失之亦易。叢書部帙浩繁，關懷既篤，度藏遂謹。^[39]

上述這段話，指出二個重點，第一：釋、道二藏之哀聚，乃屬於叢書之彙刻。所謂叢書，為匯聚總集圖書而集其大成。此種看法在劉寧慧《叢書淵源與體制形成之研究》^[40]論文中，更是明確地將佛藏、道藏之形成歸諸於叢書的彙編範疇之內而得到普遍認同。第二：儒藏之概念，意欲仿釋道二藏，但是藏的方式則有不同，儒藏採單行散刻，而釋、道二藏則係採叢書方式度藏。可見在後代人的眼中，儒藏的匯聚方式，乃為單行散刻，與佛藏、道藏叢書式的編刻方式，顯然並不相同。至於保存之效果，初無二致，其後得失則漸趨明顯。

道經音義序（見《正統道藏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8.12，卷二十四，頁720）謂一百四十卷，音義目錄及經目不在此數之中。

[37] 據（元）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二百二十四引《宋三朝國史志》曰：「唐開元中，列其書為藏，目曰《三洞瓊綱》，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。」；另，《道藏尊經歷代綱目》云：「唐明皇御製《瓊綱經目》，藏經五千七百卷。」

[38] 陳國符，《歷代道書目錄及道藏之纂修與鏤版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.12），頁135-136。

[39] 楊家駱，《叢書大辭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67.6）序引近人李雁晴語。

[40] 劉寧慧，「叢書淵源與體制形成之研究」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1.6）第四章 唐宋彙編文獻的發展。

儒藏，早先為明末學者曹學佺^[41]提出，據曹學佺《五經困學》自序所提：或問於予曰：「子之注釋《五經》也，何故？」曰：「予蓋欲修儒藏焉，以經先之也。擷四庫之精華，與二氏為鼎峙，予之志願畢矣。」^[42]

由於曹學佺修纂儒藏的念頭，乃是基於欲擷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庫之精華，與釋、道二藏為之鼎峙。錢謙益對於此事則進一步說明：「能始著述頗富，嘗謂二氏有藏，吾儒無藏，欲修儒藏與之鼎立。采擷四庫之書，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。」^[43]另外，《明史·曹學佺列傳》對於此事所載，內容幾與錢說相同^[44]，皆稱其匯聚儒學經典十有餘年，惜其功未就；其後，清周永年撰《儒藏說》則在曹氏基礎上更詳加說明，他認為：

官私之藏，著錄亦不為不多，然未有久而不散者。則以藏之一地，不能藏於天下；藏之一時，不能藏于萬世也。明侯官曹學佺欲仿二氏為儒藏，庶免兩者之患矣！邱瓊山欲分三處以藏書，陸桴亭欲藏書於鄒魯，而以孔子之子孫領其事，又必多置副本，藏于他處，其意皆欲為儒藏而未盡其說。惟分藏于天下學宮、書院、名山、古剎，又設為經久之法，即偶有殘缺，而彼此可以互備，斯為上策。^[45]

周永年對儒藏看法，乃承自曹學佺想法而來，不過他更進一步闡述認為：與其將圖書盡藏諸於一處，不如分藏於各地，以防止書籍遭至殘缺損之厄。這種做法，在蔣冬清《周永年〈儒藏說〉及其圖書館思想論》一文中，提出此乃複本藏書的思想，而建立儒藏的目的，則是「一是使古代流傳下來的寶貴典籍，能得妥善保存，自此永不湮滅，以流傳萬世；二是匯集天下書供天下人共讀，藏書以致用的主張。」^[46]然而不論是周永年的看法，或者是後人解讀，似乎皆未明確指

[41] 曹學佺(1574-1647)，字始能，號石倉，福建侯官人。萬曆進士，曾官廣西參議。因撰《野史紀略》，被劾削職，家居二十年。南明唐王稱帝閩中，授禮部尚書，清兵入關，自縊於山中。

[42] 見朱彝尊，《經義考》(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9.2)卷二五〇載曹學佺《五經困學》自序，頁3。

[43] 同註42。

[44] 根據《明史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.11)卷二百八十八《曹學佺列傳》：「嘗謂『二氏有藏，吾儒何獨無』，欲修儒藏與鼎立。采擷四庫書，因類分輯，十有餘年，功未及竣，兩京繼覆。」，頁7401。

[45] 李希泌、張椒華編，《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》(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82.2)，頁47-49。

[46] 蔣冬清，《周永年〈儒藏說〉及其圖書館學思想論》，《四川圖書館學報》，2(1998)，頁73。

出儒藏即是將所有儒家經典彙編成為一部儒藏總集，以致於儒藏此名詞，最後僅止於一種想法或概念的涵義，並無如同《佛藏》、《道藏》一般，有真正實質總集作品呈現出來。這也使得後人在提到儒藏時，並非將之視為儒家經典總集看待，而多是說明此為明曹學佺、清周永年等人提出的儒藏說法。

事實上，明末學者曹學佺提出欲仿《佛藏》、《道藏》之編輯，搜羅聚集中國儒家典籍為儒藏彙聚一處，其概念雖仿自釋、道二藏，然其聚存儒家典籍之工程浩大，僅至搜羅分輯，而未彙刻總集，與《佛藏》、《道藏》之總集彙刻，並不全然相同。故嚴格說來，儒藏與釋藏、道藏已非完全相同之概念，亦不應將其視為同義之詞。既而如此，阮元意欲仿曹學佺儒藏概念，而提倡的書藏一詞，不論從何種角度解釋，與釋藏、道藏應皆不可視為等號，或混為一談，若詳析區分，釋、道二藏，不論在詞義或者實質內容上，都與儒藏、書藏概念略有別異。

四、近代對藏書、書藏定義之析別及運用

(一) 藏書、書藏之個別定義

到了近代，藏書一詞隨時代及圖書進展，在定義及範圍上較原來最初的認知上開始有些許的不同，主要係因為使用者的差異而產生廣義及狹義範疇的分別。

首先，參檢目前坊間一般字辭典對藏書所下的定義，我們可以發現多直接以字面定義，即解釋作「收藏書籍」。這類辭典，像諸橋轍編《大漢和辭典》「藏書」條下便解釋作「儲藏書籍」，而這所指的書籍是包括所有圖書而言^[47]；臺灣商務印書館《辭源》「藏書」條下則敘述作「貯藏圖書」^[48]；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《漢語大詞典》「藏書」條下則有二種解釋，第一義解作：「圖書館或私人等收藏的圖書」；第二義則解作：「儲藏書籍」^[49]；另外，中國文化研究所編《中文大辭典》也有二種解釋，一為書名，指李贄《藏書》而言；另一義解釋作「貯藏書籍」^[50]。由此可知，一般字辭典中的藏書定義，除了李贄《藏書》書名的解釋之外，主要還是作「儲藏圖書」之義解。藏書既是儲藏圖書，那麼上自政府典藏機構，下至民間私人斗室之藏，應皆歸於藏置範圍之內，其不僅涵蓋範圍

[47] 諸橋轍，《大漢和辭典》，昭和三十四年十二月，頁980。

[48] 見《辭源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9.10），頁2728。

[49] 見《漢語大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92.6）第九冊，頁592。

[50] 《中文大辭典》（臺北：中國文化研究所，1968.3），頁169。

甚廣，而且並未對所藏圖書可能涉及的相關活動或概念加以設限。此一藏書定義，似乎較為符合最早藏書一詞出現的原始概念，也符合普遍大眾對於藏書概念的理解。

然而，由於藏書一詞的使用，除了一般性的普遍認知之外，對於研究圖書相關領域者而言，卻是希望在「儲藏圖書」的解釋之外，對於藏書的範圍及定位再做進一步深究，試圖為其找出明確清楚的定義。近年來，也確實有部份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，像是王余光、徐雁等編《中國讀書大辭典》一書中，對於藏書一詞，除了通論性的解釋作儲藏書籍之外，還增加了以下的詮譯：

指典籍圖書的收藏活動。在歷史中國，特指皇家、私家、寺觀、書院等的典籍圖書的收藏。其概念往往不僅僅指藏書，而且還包括與之有關的購置、鑒別、校勘、裝治、典藏、鈔補、傳錄、刊布、題跋、用印、保護等一系列活動。^[51]

上述說明，不但將藏書的原始概念表達出來，而且還將與藏書相關的活動一併列入，像是購置、鑒別、校勘、裝治、典藏、鈔補、傳錄、刊布、題跋、用印、保護等等。這些與藏書相關的活動，實是自藏書發展歷程中不斷衍生出來，透過不同朝代藏書活動的逐漸增益與要求，遂而發展至今日完整藏書概念的形成。

除了《中國讀書大辭典》對藏書一詞加以解釋之外，另在徐雁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歷史藏書的研討成果概述 一文中，也指出於1995年「中國當代藏書活動研討會」會議進行期間，經與會學者專家討論結果，認為藏書定義須再作修正，初步形成的共識是：

藏書是指人類為閱讀、保存、鑑賞、研究和利用為目的，而進行的收集、典藏圖書的活動。^[52]

事實上，不論是《中國讀書大辭典》中的藏書詮譯，還是「中國當代藏書活動研討會」會議眾人對藏書所下結論，我們進一步探索便可看出，這些「購置、鑒別、校勘、裝治、典藏、鈔補、傳錄、刊布、題跋、用印、保護等一系列活動」，或者「為閱讀、保存、鑑賞、研究和利用為目的」說明，乃是經過他們參

^[51] 見王余光、徐雁等編，《中國讀書大辭典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.7），頁440。

^[52] 徐雁，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歷史藏書的研討成果概述，《中國史研究動態》，1999：4，頁10-18。

酌各朝代不斷增益與收藏圖書相關之種種活動，重新考量藏書的範疇與目的所賦予的新定義，此一藏書定義實已經超越最初指收藏的單一意義，進而跨越至屬於文化層面的深層涵義。如此一來，藏書不再是無所為的藏放行為，而是牽涉到人類深層思想的表現，不僅是人類文化呈現的表達方式之一，同時典藏圖書的意義與價值也因此確立更加清楚。

至於書藏一詞，在筆者翻閱多部字辭典後，幾乎找不到任何一本字辭典對此詞所下的解釋或定義，可見書藏一詞到了近代，已不再被視為普遍常見或特殊意義之專有名詞。即如當初清阮元為了支持曹學佺、周永年等人的儒藏說，而特別建造的「靈隱書藏」及「焦山書藏」，到了清末，仍有梁鼎芬為仿「焦山書藏」而建「豐湖書藏」^[53]，希望能為阮元提出的書藏說貢獻一點力量，不過顯然未能普及。由於對書藏的定義不甚明確，加上阮元的書藏說並未達到他所想要的效果，因此近代學者在使用書藏一詞時，反而呈現出與清代書藏概念並不相同之運用。

(二)藏書、書藏之文獻運用

關於藏書跟書藏此二名詞的使用情形，由於範圍可廣可狹，為避免討論過於浮濫，擬以具學術觀點之相關專書與期刊論文為主要探討範圍。一般來說，論及藏書，大多仍以「收藏圖書」之定義為主要認知概念，這樣的認知，一則歸因於坊間字辭典的字面直譯，另一則受到古代藏書概念影響所致。因此，在為數眾多的學術專著或單篇論文中，其於藏書方面的探討時，也多直接就圖書收藏談起，幾少會對藏書詞義及範疇加以說明或規範，而由於此種藏書研究相關專著及學術論文數量過於繁多，不及備載。僅有極少數學者會將藏書範疇認定在：除了原有收藏圖書的定義之外，舉凡與藏書相關之活動或現象，亦應歸屬於藏書的範圍之內。

至於書藏一詞的使用，雖未見於專書，然無獨有偶，有幾篇學術性的期刊論文則正好出現書藏一詞的運用。以下便按論文發表時間的先後，稍作略述。梁子涵先生「中國書藏的側面」^[54]一文中，將中國從清代至近代藏書的幾個現象分

[53] 豐湖書藏，為清廣東豐湖書院藏書處，仿清江蘇焦山書藏建。清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梁鼎芬創。藏書豐富，係清季廣東書院中藏書最多者。參見趙國璋、潘樹廣，《文獻學辭典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1.1），頁113。

[54] 梁子涵，「中國書藏的側面」，《圖書館學報》，7（1965.7），頁103-112。

段論述，首先從洪亮吉、葉德輝論藏書家談起，其次論其藏書數量，末則講述公私宋元藏本作偽等論題，對照論文標題與內容，皆論述藏書之事，顯然梁氏是直接將書藏二字作為藏書的倒裝義來運用。再者，盧荷生先生《漢代主要書藏考》一文中，分別就漢代「石渠閣即博士之藏」，「蘭臺石室與御史之藏」，以及「秘書監與東觀之藏」此三部份，探討兩漢的國家藏書之所與藏書的關係。文中凡論及藏書，多以書藏代稱，末並作結說道：「兩漢書藏，為數頗多，但最主要者則為石渠、蘭臺與東觀。茲特試為考證如上。」^[55] 由此述說，加上內文種種論述之語看來，顯然同樣將書藏二字視為藏書的倒裝義。除了上述論文之外，吳師哲夫先生發表《沈氏研易樓的宋版書藏》^[56]，以及《故宮宋版書藏的傳世意義》^[57] 此兩篇論文，前者是在述說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69年得自於民間沈仲濤先生研易樓的一批珍貴宋版藏書；後者則是探討典藏在故宮博物院善本書庫之間流傳久遠、校刻精審，且極具歷史價值與意義之宋版圖籍。此二篇在文字述說上皆以書藏雅代藏書，從論文的文字陳述，其運用書藏二字如見藏書蘊義般流暢自然，顯見書藏用法已受到中國文字倒裝運用的影響，與藏書涵義相同。此外，還有張憲文《瑞安孫氏玉海樓書藏考》^[58]一文，其論述內容為探討孫衣言玉海樓之私人藏書概況，凡言藏書亦多稱以書藏。由以上各篇學術性論文對書藏二字的運用情形看來，近人以書藏涵蘊藏書之義的用法，似乎並沒有受到清朝阮元書藏說的影響，反而在經過時代變遷，自然形成一種文字運用上的技巧或習慣，而這種將文字倒裝的運用方式，在修辭學上自是有其根據。

從語法修辭學的角度^[59]，倒裝句法的運用，是古代文人雅士經常使用的一種修飾句型。其主要作用有二：第一為加強語氣，目的在使此語一出便令人有強烈印象的作用；第二則有美化字詞之功能，或有搭配音韻語調的協調作用。傅隸樸《修辭學》論「倒裝」時，便說道：

倒裝是言語倫次上下顛倒的安置法。言辭本該依事物的程序排列，但有時嫌

[55] 盧荷生，《漢代主要書藏考》，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》，20：3（1983.3），頁281-291。

[56] 吳哲夫，《沈氏研易樓的宋版書藏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24（1993.7），頁10-17。

[57] 吳哲夫，《故宮宋版書藏的傳世意義》，《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，2000.3），頁339-354。

[58] 張憲文，《瑞安孫氏玉海樓書藏考》，《文獻》1988：3，頁188-205。

[59] 見王協，《中國語法理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7.3）對倒裝法的看法：「中國語的倒裝法，多半由於誇張，或由於加強否定的語氣。」，頁228。

其平板爛熟，反容易使閱讀者眼滑口滑，而囫圇其深情曠旨，故善為文者，往往在關要處，故亂其序，一方面梗澀讀者的眼口，喚起其注意，一方面又增加文章的波瀾。正如瞿唐江水，必藉灘瀨堆的阻遏，才成其壯觀。這種道理正與律詩拗句相同。^[60]

因此，上述學者使用書藏一詞之概念，係承自古人文句修辭慣用的方式之一，自是有所依循。再則，我們還能從近代學者對於藏書與書藏此二名詞的運用上，看出：由於書藏一詞在發展歷程中，並不曾有過明確的認定及定義，因此從古轉今，隨著時代轉變及使用對象理念的差異，其可能會被視為藏放圖書的處所，或者阮元一心想要提倡的書藏說遂不再復見，到了近代，更是普遍可見以藏書意義來詮譯書藏的約定成俗用法。

五、結語

一般而言，論述藏書相關議題時，最常使用的詞語仍是「藏書」二字。不論是從圖書領域探討、學術論文研究，或者期刊論文，甚至於一般報章雜誌上所使用的藏書二字，多數人都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藏書一詞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，它廣泛地被理解成：不論公家或私人所收藏的任何圖書典籍，皆可囊括在藏書涵義的範圍之內。因此，對於藏書一詞的普遍運用，我們不得不歸功於它在定義上的清楚明確，以及自古而今藏書概念的逐漸形成與不斷增衍。

至於書藏一詞，則歷經輾轉波折，從宋蘇軾題字到清阮元倡導，以至近人使用習慣，其概括有藏書處所、阮元仿儒藏說的書藏概念，以及藏書的倒裝句法這幾種可能性的解釋。雖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來，清末以前對書藏的運用，與近代學者的使用習慣並不相同，這或許是跟書藏一詞在最初定義時便沒有清楚界定有關，也或許是因為阮元欲立書藏之願未能成就的緣故。然而，語詞的流行特性之一，便在於語詞的通用性與接受度，這也說明了時至今日，我們對於書藏一詞的認知，不僅不再受到清阮元書藏說的影響，反而是以時人習慣或接受的語詞用法為主。對於書藏一詞的運用，顯然將其視為藏書的倒裝義的接受度極高，也就是說，書藏二字，雖然可能會因為藏字音讀不同而產生定義上的差異，以致有不

^[60] 傅隸樸，《修辭學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69.3），頁34。

同的運用，然而一般來說，將藏字讀為平聲，視書藏為藏書倒裝義的運用習慣，還是比將書藏視為藏置書籍的處所，或者將其視為阮元書藏說的看法，來得普遍且更被認同。

藏書與書藏，就其發展時間先後，藏書一詞出現時間要比書藏早出許多，其定義與運用習慣也在很早以前便已確立。從古而今，藏書定義並沒有很大的轉變，只有不斷地增益衍生；至於書藏，從宋朝到清末之間，書藏一詞的運用雖不普遍，但因有阮元倡導之書藏說，故藏書與書藏二詞在近代以前仍多各行其軌。然而，時代更迭，也反映在詞語的使用習慣上，由於近代學者語及書藏，多以藏書倒裝義界定之，即藏書與書藏定義到了近代以後開始產生兼用情形。就運用上，自有修辭學倒裝句法之依循，且語詞運用多由約定俗成而來，並無對錯之別。然則，藉由藏書與書藏的探討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書藏一詞在不同時代的運用，及其詞義上的轉變，還能因而瞭解古今語詞的運用與轉化，進而有更清楚的認知。

The Difference in Chinese Between "Chang-Shu" and "Shu-Chang"

Yuan-ting Hsu

Abstract

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,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using the word "Chang-Shu" to mean the reservation and location of books. After the Sung dynasty, the word "Shu-Chang" came into use. As time passed and customs evolved, "Chang-Shu" and "Shu-Chang" came to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between recognizing vocabulary and application by definition. Meanwhile, while the Chinese name of "Shu-Chang (Zang)", "Fo-Zang (a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)", "Dao-Zang (a collection of Taoist sutras)", "Ru-Zang (a collection of Confucian sutras)" are very similar,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s of mutual derivation and influence. These are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as well as and searchers. In order to know the "Chang-Shu" and "Shu-Chang" clearly,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both terms.

Keywords (關鍵詞): 藏書 ; 書藏 ; 佛藏 ; 道藏 ; 儒藏

Book Collection ; Shu-Chag(Zang) ;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;
Collection of Taoist Sutras ; Collection of Confucianism Sutras

Yuan-ting Hsu : Lecturer, National Taipei College of Business ; E-mail:kikibooks@mail2000.com.tw